

# 沒有終結的「終結」： 中美俄關係的變化

馮紹雷

「九一一」事件發生一年來國際社會的最主要變化之一，是大國關係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雖然，短短一年的急劇變化還不足以為全面理解這種變化提供足夠的背景資料，但是，無論是理論考量，還是對動態的進一步把握，又使得對這種大國間關係變化作出梳理和某種解釋顯得十分必要。

本篇論文集集中討論「九一一」之後中、美、俄三國關係發展的動因與特點，也涉及歐洲。本文力圖對上述變化作出某些趨勢性的分析。當然，任何構想中的發展趨勢都將受到高度動態中的形勢發展的影響而表現出某種偏離，就像「冷戰的終結」，「後冷戰的終結」等等被稱為「終結」的歷史過程，卻都難以使其歷史影響瞬間消失。

「九一一」之後大國之間關係已完全不同於冷戰之前，中、美、俄三邊關係中的任何一組雙邊關係，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雖然發展的速度與向度並不一致。總體上體現了國際社會希望保持大國間關係穩定與互利，而不希望因「九一一」這樣的突發事件引發重大動盪的基本心態。

## 一 「九一一」之後大國關係發展的特點

總起來看，「九一一」之後大國之間關係已完全不同於冷戰之前。如果從力量對比關係、所面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九一一」之後出現恐怖主義這個共同敵人這幾個方面來說，情況的確已經大大不同。比如，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這一現實的存在，意識形態因素的相對淡化（只是相對而已），大國間行為規則的變化——至少在形式上都強調發展三邊關係中的雙邊關係不是針對第三者，換言之，作為第三者，都歡迎三邊關係中任何其他雙邊關係的發展。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九一一」事件所激起的大國關係變化中，尤其是中、美、俄三邊關係中的任何一組雙邊關係，在「九一一」之後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雖然發展的速度與向度並不一致，但總體上體現了國際社會希望保持大國間關係穩定與互利，而不希望因「九一一」這樣的突發事件引發重大動盪的基本心態。這可以說是迄今為止大國關係發展中最重要的特點。

美俄關係是「九一一」後整個國際社會中最引人注目、取得最大進展的一個方面。2002年5月下旬，在聖彼得堡舉行的美俄峰會和在羅馬舉行的俄國與北約峰會上所簽訂的《美俄削減進攻性戰略力量條約》、《美俄新戰略關係聯合宣言》，以及以「二十國」合作機制為核心建立的俄羅斯—北約理事會，是「九一一」後美俄關係取得重大發展的階段性標誌，也是自1989年東歐政治劇變以及1991年底蘇聯解體以來，被稱為「冷戰結束」的歷史過程整整延續了十二三年之後，以法律框架形式真正告一段落的歷史性象徵。雖然，美俄之間無論在政治、經濟、安全等領域都存在大量有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在裁減戰略核武器和俄羅斯—北約關係方面出現的重大轉機，勢必進一步推動雙邊關係全面發展。美俄峰會之後，美國政府迅速承認俄羅斯為市場經濟國家就是明證。美俄這兩個冷戰對手在核武庫削減方面有所節制，這多少是有利於人類生存的福音；俄羅斯通過與北約國家合作這一途徑改善美俄雙邊關係，這不光可視為是一種歷史的推進，而且顯然會深遠影響長遠的歐亞格局乃至全球均衡。

在美俄關係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中俄關係也相應獲得了提升。緊接着美俄峰會之後，中俄國家元首與中亞四國元首在上海合作組織聖彼得堡會議上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憲章》，決定建立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並宣布上海合作組織「並非集團或封閉性聯盟」，為上海合作組織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合作，以及周邊國家今後可能的逐步加入提供了法律與政治基礎，為這一個在「九一一」事件中經受衝擊與考驗的區域合作組織注入了新的元素。就中俄雙邊關係而言，聖彼得堡峰會前夕，普京(Vladimir Putin)總統在接受《人民日報》社長許中田採訪時明確表示：俄羅斯「與中國向世界提供了國家關係的新模式，其中要把自覺不結盟和協調努力維護共同利益結合起來。這個關係的模式規定，夥伴之間的關係平等，本着相互信任的精神來解決一切問題，這就是俄羅斯與中國在『冷戰』結束之後對於建立新型的多極化國際秩序的巨大貢獻」<sup>①</sup>。普京對於「自覺不結盟」和「多極化國際秩序」的認同，顯然為中俄兩國雙邊關係的原則性立場提供了重要說明。具體地說，雖然中俄關係之間並非沒有需要協調解決的利益與認識問題，但中俄經貿合作特別是能源合作的深化，中俄軍事技術合作的「高質量」(普京語)，以及中俄在一系列全球問題與地區問題方面進行戰略協作的現存機制與巨大潛力表明：即使美俄關係有了重大突破，也不意味中俄之間的戰略合作失卻了其獨立存在的意義。正像普京所言：中俄關係「這台『發動機』連續不斷的工作實際上並不取決於外部因素的影響，因為它有自己的『能源』」<sup>②</sup>。

儘管「九一一」後中美關係的發展沒有像美俄關係以及中俄關係那樣以國際法形式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九一一」後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兩次訪華，以及胡錦濤副主席赴美訪問，足以顯示雙方領導人對於雙邊關係的重視，以及共同構建「建設性合作關係」的願望。美國繼續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恢復中美軍事交流合作，以及中美在反恐問題上的合作，都顯示了中美間進一步發展合作關係的巨大空間與潛能。雖然中美在台灣問題等一系列雙

美俄在裁減戰略核武器和俄羅斯—北約關係方面出現重大轉機，勢必推動雙邊關係全面發展。但美俄關係的重大突破並不意味中俄戰略合作失卻其獨立存在的意義。正像普京所言：「中俄關係這台『發動機』連續不斷的工作實際上並不取決於外部因素的影響」。

邊多邊問題上還存在尖銳的分歧，但是中美關係作為後冷戰時期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係，在各自國內，以及在國際社會普遍引起了高度重視，這一事態本身就表明其中蘊含着實現某種進一步調整的機會與可能性。特別是中國對美俄關係大幅度改善明確表示歡迎，這不僅僅體現出中國對於與己相關的外部世界重要變化的理性態度與成熟良知，也反映出中、美、俄三邊關係中並沒有失卻發展相互間理解與尊重的基礎。總的來說，在「九一一」這樣的突發事件的衝擊之下，大國間關係尚未突破借機伸展與既定格局之間的平衡；各方還是在尋求被突發事件所激發的利益與理念的分殊與長遠發展、長遠考量之間的協調。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九一一」後的大國間關係是伴隨着若干前所未見的傾向而得到發展的。中、美、俄等大國間關係的發展並沒有掩蓋大國間正在出現力量消長和相互競爭。就這一方面說來，「九一一」之後中、美、俄關係中出現了這樣幾個方面的特點：

其一，日益增長的單邊主義傾向和主張多邊合作的願望這兩者形成了鮮明對照。雖然，許多場合下，單邊主義路線是以多邊的形式出現，但在「九一一」之後，某種程度上說，當今世界還是沒有避免面臨着一種重新被分成兩半的危險。

對美國來說，「九一一」的打擊成為美國國民心理受到挫折以後，反而得以凝聚的強烈推動力，從而成為民族情緒、愛國情緒得以提升的機會。這種國民情緒的劇烈變化和「九一一」之前已經在布什外交當中存在的那種崇尚強權的傾向不謀而合，成為單邊主義路線的一個非常複雜的背景；對其他國家和地區來說，當突如其來的「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各國人民和政府都對死難者表示同情，並譴責恐怖主義行徑；對美國推動的國際反恐怖進程，大都給予不同方式的支持。即使人們對布什以各國對「九一一」事件的態度來「劃線」的做法有所保留，但仍然沒有作出太多的批評。其中相當部分是由於「九一一」事件所激發的道義責任和所形成共同利益在起作用。直到布什執意要退出反導條約，一意孤行地準備向伊拉克開戰，以及美國國防部所擬就的準備向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率先實施核打擊的規劃曝光以後，人們才清楚地認識到，布什政府沒有像人們所期望那樣，在「九一一」之後調整自己的發展方向，採取多邊合作的態度，反而採取了更加強硬的單邊主義立場。由媒體所披露的美國高層對未來安全戰略的討論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試圖把實行了幾十年的「遏制與威懾」戰略，改為主張對恐怖主義和敵對國家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這一很可能在未來打擊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中得以體現的軍事新戰略，勢必會對國際社會造成深遠影響。

但是，即使如此，中國、俄羅斯這樣一些因此而具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國家，從雙邊以及全局利益、長遠的利益出發，仍然是用比較靈活、冷靜和克制的態度和美國打交道。因此，「九一一」之後國際社會的重要現象之一是：主張多邊合作、以及主張單邊強勢的兩種態度之間的鮮明反差。這是在冷戰結束以來，甚至是很長一個歷史時期當中，所沒有看到過的現象。

「九一一」後，各國對美國的反恐進程給以不同方式的支持，直到布什執意退出反導條約，一意孤行要向伊拉克開戰，以及美國國防部準備向一些國家率先實施核打擊的規劃曝光以後，人們才清楚地認識到，布什政府沒有像人們期望那樣採取多邊合作的態度，反而採取了更強硬的單邊主義立場。

其二，「九一一」之後的大國關係表明一個差等式的，甚至有點像羅馬帝國式的這樣一種力量構成似乎正在得到體現。但是這種力量結構卻遠遠沒有得到體制上的保障。我認為目前的國際關係仍然處於具有多種前景的一種過渡階段，具有較大可塑性。

「九一一」事件本身的確使得冷戰後的國際社會進入了全新的階段。恐怖主義成為不光是美國而且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所面臨的嚴重問題，但是另一方面，以「九一一」作為時代的界線，宣布從此進入「後冷戰階段」，把「反恐主義」作為整個國際社會的首要普遍目標，仍然存在爭議。對於整個國際社會而言，反恐是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問題。事實上，「九一一」令冷戰之後已經出現的若干新問題、新趨勢進一步強化。筆者不完全贊成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論」，但是我們也確實看到：冷戰之後大量湧現出的不同種族、不同文明之間的隔閡、誤解與衝突日益加深，由於「九一一」事件而得到了加強，這是一個可怕的情景，我們應怎麼管理這個情景？是以羅馬帝國式的方式，還是採取一種新的面向實際的多邊合作方式？這是一種原則性的區別。雖然美國擁有了獨一無二的強大實力，但是如果美國想要採用羅馬式的態度來解決問題，不會得到國際體制的確認與支持。從經濟上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 (WB)、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已經不再像戰後初年那樣是美國稱霸世界的工具，來自精英層面、大眾層面日甚一日的「反全球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反美」的含義；從政治上看，最重要的國際組織——聯合國更不像戰後初年那樣唯美國之命是從；冷戰年代搭乘便車的盟友西歐、日本越來越公開地在各種國際場合對美國的單邊主義表示不滿與抵制；從戰略上看，甚至像北約這樣的組織，都沒有對這種單邊主義傾向真正給以實質性的支持。「九一一」之後，北約僅在口頭上以集體安全條款表示支持美國，而沒有以北約組織的身份參與反恐軍事行動；而且當6月上旬，美國所謂「先發制人」的軍事安全戰略即將出台之前，北約秘書長羅伯遜 (George Robertson) 首先宣布：北約依然是防禦聯盟，「我們不應該沒事找事」。當俄羅斯以非正式成員身份進入北約之後，越來越多的冷眼旁觀者認為：俄羅斯究竟是就此束手就擒，還是鑽進北約的圈子裏進行搗亂，實在還是未知之數。如果和冷戰時期相比，美國在當時對它的雙邊安全戰略還有一整套規範、體制，以這些制度作為保障。但是今天人們看不到這種東西，不是不想做，而是要做到這一點有困難。所以，相比之下，正在加深的歐洲一體化進程，隨着歐盟實力的崛起，組織化程度越益提高，越來越成為多邊力量結構的一種示範，產生了深刻廣泛的影響。因此，從長遠來看，這與美國力量獨大而得不到國際體制支撐的現象形成鮮明對照。「九一一」之後，作為西方制度最主要基礎的歐美關係，越來越顯示出結構功能上的裂痕，對歐美關係前景的擔憂，已經成為西方精英中越益流行而迫切的話題，從這一角度證明了這種力量結構變化與體制保障之間的緊張關係。

其三，「九一一」之後出現的另一個突出現象，是大國影響與力量的消長變

冷戰之後不同種族、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日益加深，而這些又由於「九一一」事件得到了加強，這個情景是以羅馬帝國式的方式，還是採取多邊合作方式來加以管理呢？作為西方制度最主要基礎的歐美關係，越來越顯示出結構功能上的裂痕，對歐美關係前景的擔憂，已經成為西方精英中越益流行的話題。

化集中在亞洲的次區域層面。這裏所指的次區域層面，既包括中亞、外高加索等前蘇聯勢力範圍，也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所處的南亞次大陸，當然還包括東南亞。「九一一」之後的中亞，俄羅斯力量與影響的消退與美國的進入，已經是持續了相當長時間的明顯趨勢。在南亞次大陸，大國力量的消長也非常明顯，特別體現在美國對印巴事務干預力度的大幅增強。東南亞由於有東盟的存在，使之成為了整個東亞組織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中國和東盟在2001年底簽署自由貿易區的初步協定，成為東亞區域進程中的一個亮點。這是中國持續參與多邊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步驟。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一些大國的反應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日本首腦隨即在2002年初訪問東盟。上述三個在「九一一」之後大國影響消長比較明顯的地區都集中在亞洲，而且都集中在中國的周圍。即使這只是偶然的情況，也值得戰略家的深思。

## 二 「九一一」後中、美、俄關係變化的動因

總的看來，「九一一」後大國關係變化的動因來自於三種相互作用。

冷戰的結束，造就了一個統一的德國，歐洲各國以歐盟為形式大大加速了政治與經濟一體化進程，同時也為中國的崛起以及俄羅斯的復興帶來了機會。各大國發展態勢表明，與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同時存在的，是一個潛在的多元結構的發展趨勢。

第一種相互作用指的是國際社會長期演變所積累的能量與「九一一」突發事件的相互作用。「九一一」之後，中、美、俄之間的關係變化必須放到冷戰後的國際環境中加以考察。冷戰後國際社會發展中有兩個方面的重要態勢是與「九一一」之後的中、美、俄關係變化直接關聯的。

第一，是冷戰後各大國（地區）的發展態勢。簡言之，美國在冷戰之後成為當今世上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冷戰的結束造就了一個統一的德國，為了避免統一德國的出現造成歐洲力量格局失衡，以及為了參與未來的國際競爭，歐洲各國以歐盟為形式大大加速了政治與經濟一體化進程，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冷戰結束為中國的崛起提供了歷史性的契機，使它有可能佔據日益重要和顯著的國際地位。甚至，冷戰結束也為俄羅斯的復興帶來了機會，因為俄羅斯可能從此擺脫僵化保守的社會經濟模式的束縛，得以逐步融入國際大家庭而成為受人尊敬的一員<sup>③</sup>。冷戰後各大國（地區）發展態勢表明，與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同時存在着的，是一個潛在的多元結構的發展趨勢。不關注這一態勢，不可能深入理解「九一一」後大國關係的戲劇性變化。

第二，冷戰後另一值得高度關注的現象，也是作為大國關係變化的深刻背景，那就是全球化進程的發展態勢。近二三十年來，作為客觀歷史現象的全球化進程，增進着商品、資金、信息、技術與人員的流動，推動着世界經濟發展，為人們拓展了視野帶來了新的機會。客觀地說，沒有全球化就不會有今天的繁榮。但是，全球化進程也不可避免地摻和着主觀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在全球化過程中處於優勢地位的國家與利益集團，很難不運用全球化所帶來的機會，拓展自己的利益與影響。近年來人們看到的一個明顯迹象是，隨着全球化

的推廣，佔人口15%的西方工業國家與佔人口60%以上的貧困國家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而美國國內貧富差距在90年代以後也進一步擴大。晚近十年，世界經濟發展的總體速度與此前相比不是提升，而是有所降低，一般認為這是發生在全球化進程進展最快的時期。

在此背景之下，就較容易理解為何人們至今仍在激烈爭論全球化問題。每當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舉行年會，總會遭遇大規模的有組織抗議。甚至在歐洲和俄羅斯，人們可以發現更多的對全球問題的反思與批判。在這個背景之下來觀察「九一一」事件的發生，一方面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的以平民為人質的血腥暴行；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大潮所激起的種種複雜反響，與「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具有某種深刻的儘管可能是間接的聯繫。

如果說全球化進程為各個國家與地區帶來的，是並不均等的機會與挑戰，那麼，在冷戰後十多年歷史變遷中各得其所的各大國與地區，就成為這樣的機會與挑戰的物質承擔者。可以說，上述這兩方面的相互交織與相互依存，成為「九一一」後大國關係變化的重要背景。

當然，上述近一二十年來國際社會的深層變化，如果沒有像「九一一」這樣突發事件的激發，也並不會構成「九一一」之後的大國關係——特別是中、美、俄關係的變化。以中亞為例，「九一一」之前，中亞並不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非常緊迫、非常核心的戰略區域。但「九一一」後情況就發生了根本變化。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假如說，美國沒有在冷戰後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並且沒有借助全球化的推動取得今天的實力和地位，同時，假如俄羅斯也不像今天這樣疲弱，急需西方的經濟支持，那麼，美國與俄羅斯便不可能達成默契，同意美軍進入中亞。

第二種相互作用是指「雙邊關係」與「多邊考量」這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

在西方，也許2002年5月下旬，布什總統在聖彼得堡受到的熱情歡迎和在柏林受到的冷遇和批評，可以看作是當前美俄關係和美歐關係出現反差的明顯象徵。儘管人們可以以「夫妻間的爭吵」來形容當前的美歐關係，以「鄰居間的和好」來形容當前的美俄關係，似乎這兩種關係依然完全屬於兩種不同類型，但是，隨着形勢變化，「美俄接近，意在歐洲」或者「美俄接近，緣起歐洲」正在成為當前大國關係中的一個微妙背景。

本來，歐俄間的合作與相互依賴程度要超過美俄間的程度。實力強大的美國以前似乎並不太在乎這樣的不均衡態勢。但在「九一一」事件的發生以及歐洲迅速崛起的背景之下，也是在美歐關係中的結構性弱點越來越成為相互理解與合作的障礙之時，特別是當美國得不到作為整個組織的北約與歐盟對其單邊主義政策的全面而又實質性支持的時候，美俄接近，對歐洲示以眼色，並非不是對歐洲有所求索的一種迂迴的表達。當然，事情的另一面是，歐洲也希望借助美國來防範擬想中可能威脅歐洲局勢穩定的因素（包括擬想中的來自俄羅斯的動盪），而俄羅斯則希望在歐、美之間斡旋中贏得更大空間，而且值得玩味的是，

今年5月下旬，布什總統在聖彼得堡受到熱情歡迎而在柏林受到冷遇和批評，人們以「夫妻間的爭吵」來形容當前的美歐關係，以「鄰居間的和好」來形容當前的美俄關係。但是，隨着形勢變化，「美俄接近，意在歐洲」或者「美俄接近，緣起歐洲」正在成為當前大國關係中一個微妙背景。

普京往往是在高舉「返歸歐洲」大旗的前提之下，反而借機迅速在對美關係上取得突破，這就是當前歐、美、俄之間相互關係的一個複雜背景。

當前美俄關係的突起還涉及到對東方事務的關注。一些西方學者並不掩飾，美俄接近的共同驅動力在於反恐合作、戰略武器的削減與防止擴散、能源供應與投資方面的相互需求。還有相當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共同應對中國正在崛起成為大國這樣的事實」。雖然，任何雙邊合作不針對第三者已在形式上成為後冷戰時期國際行為的一種規範，但是，關注「第三者」，影響「第三者」與上述規範事實上也是互為補充。值得進一步觀察的是，美俄將如何「共同應對」正在崛起的中國。這裏的「共同應對」至少包含着兩種含義：第一，美俄間相互加深理解中國崛起的現實，旨在推動中、美、俄之間共同協調發展；第二，西方有人也可能從消極立場出發，把中國的發展視為一種壓力來加以防範。

美俄接近的其中一個共同驅動力是「共同應對中國正在崛起成為大國這樣的事實」。這裏的「共同應對」至少包含着兩種含義：第一，美俄間相互加深理解中國崛起的現實，旨在推動中、美、俄之間共同協調發展；第二，西方有人也可能從消極立場出發，把中國的發展視為一種壓力來加以防範。

第三種相互作用指的是思想原則、觀念形態與權力、實力之間的相互作用。這裏尤其說的是，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決策理念與其所擁有的實力之間的相互作用。當前的大國間關係，雖然已不再是冷戰年代意識形態高度對抗的情景，但是中、美、俄之間還是未能避免一種重新被意識形態化的趨勢。上世紀90年代初的歷史終結論、民主國家和平論正在變成一種新的東西。筆者認為它似乎正轉變成冷戰當中的獲勝者具有無限擴張能力這樣一種新的神話。這種新的神話至少包含下面幾個意思：

其一，西方民主國家的任何對外行為，都可以簡單化為自由、民主原則的擴張。事實上，從學術上說，從法國著名學者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一直到當代的學術界，都沒有辦法證明這種牽強附會。相反，托克維爾從來認為：一個國家的內部制度與其對外政策之間沒有某種固定的聯繫。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歐洲系主任卡萊歐 (David Calleo) 認為，事實上，無論是從康德 (Immanuel Kant) 的「永久和平論」還是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都無法推導出「民主國家和平論」<sup>④</sup>。哈佛大學教授格林菲爾德 (Liah Greenfeld)，在其《資本主義的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中提出一個觀點，認為在資本主義全球系統形成過程當中，民族主義不光像韋伯 (Max Weber) 所認為的那樣，起着一種形成內部認同的作用，它對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也起着推動作用。所以，民族國家利益、民族主義有時是可以以自由民主這樣一種形式出現的。因此，「九一一」之後美國式民族主義的崛起是相當值得關注的現象。

其二，迷信強權，認為軍事暴力手段可以解決所有複雜問題。在「九一一」之後的美國決策理念中，可以明顯地發現崇尚權力的「現實主義」理論原則正在發生決定性的影響。據筆者的觀察，這樣的「現實主義」大體上有三種表現：

第一種可稱之為「樂觀的現實主義」。如《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雜誌主編克勞瑟麥 (Charles Krauthammer) 所提出的那樣：「九一一」所帶來的強烈震盪使民眾大大強化了對民族國家利益與安全的心理認知，並且這種心理認知具有超越國界的擴張性，因此只要美國敢於顯示實力就能取得成功<sup>⑤</sup>。

第二種可稱之為「悲觀的現實主義」。也即為著名的現實主義者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所尖銳指出的：不能相信歐洲盟國和俄羅斯會真心與美國組成「反恐聯盟」。上述的每一方不過是利用美國反恐怖行動的需要而各有所圖而已。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多半只能以單幹的方式進行反恐怖<sup>⑥</sup>。

第三種可稱之為「歷史的現實主義」。美國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沃爾福威茨 (Paul Wolfowitz) 也許可被視為這一種思潮的代表人物。沃爾福威茨曾於近年發表長文，提出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既定秩序捍衛者」的民主英國遭到了作為「對現存秩序挑戰者」的「正在崛起的權威主義的德國」的發難，因而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沃氏以此比附當今的中美關係，直言中國是「現存秩序的挑戰者」<sup>⑦</sup>。布什政府競選期間及爾後一再把中國作為「潛在的競爭對手」對待，並擴大對台灣的軍售，與沃氏理念有着直接的聯繫。

值得注意的是，在「九一一」事件後一個多月，沃爾福威茨在《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的一篇訪問中改變了調門。他在談到中國未來發展後果時，明確地表示：「中國經濟增長越快，軍事就會越強大……軍事上強大了並不一定意味着軍事擴張。」尤其有意思的是，沃爾福威茨反而批評道：「歷史悲觀主義者說，一百多年前，德國與日本強大起來以後就是走的這條道路。我認為，歷史不一定非要重演不可。中國的經濟增長使它具有巨大的軍事潛力，但是經濟增長也使和平與中國利益息息相關。」直到2002年5月29日，沃爾福威茨甚至在華盛頓外國記者中心的會議上明確聲明：「美國反對台灣獨立」。

無論是「樂觀現實主義」、「悲觀現實主義」，還是「歷史現實主義」，總的傾向是強調「九一一」後美國對外政策中的強權原則。雖然，這種強權原則在某些情況之下也會側重於強調均衡、強調聯盟——如沃爾福威茨在「九一一」之後的言論變化，但是這一點不妨礙實力原則對美國對外戰略的決定性作用。與實力原則的至高無上性相適應的是，追求本國安全的絕對性，以及相信光憑單邊主義的行為方式就可以建立起新的國際秩序。人們經常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也許要再補充一句，絕對的優勢也可能導致絕對的混亂。

其三，與當代國家間關係的重新被意識形態化這一問題相關，當前西方媒體乃至學術界一個相當普遍卻又相當含混的表述是：某某國家可以「融入西方社會」或者「成為西方社會的一員」。比如，在美俄關係的討論中，上述命題就曾經成為判斷美俄關係前景的主要根據。由此產生的問題是，像俄羅斯這樣雄踞歐亞大陸文明結合部遼闊地帶的前超級大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融入」西方。

自彼得大帝以來近四百年學習西方的漫長歷史過程中，雖然俄國社會經濟發展深深打上西方的烙印，但是，俄羅斯始終沒有被「融入」西方或「變成」一個西方國家，這是一個不得不令人思考的歷史背景。歷史地看，也許學習西方是任何非西方文明背景國家的改革家、政治家孜孜以求的真誠願望，但是，學習西方畢竟不能等同於可以把一個帶有深厚本土特徵與歷史慣性的國家或民族脫胎換骨地變成一個「西方國家」。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的「十年轉型」歷程也可證

「九一一」之後的美國決策理念和外交政策的總傾向是強權原則。這種強權原則在某些情況之下，也會強調均衡、強調聯盟，但是這一點不妨礙實力原則對美國對外戰略的決定性作用。與實力原則相適應的是，追求本國安全的絕對性，以及相信光憑單邊主義的行為方式就可以建立起新的國際秩序。



明，那種簡單化、理想化的「改造」俄羅斯計劃之所以失敗，關鍵就在於一開始就存在着類似於上述命題的不切實際的空想。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普京總統推動與西方調整關係的關鍵時刻，在去年年底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俄羅斯民眾在大體接受普京外交調整的同時，僅有11%的人接受今後俄羅斯的發展以西方模式為取向，而70%以上的民眾表示，俄羅斯的未來發展應以帶有俄羅斯本土特徵的歐亞模式為取向。雖然上述民調不排除民眾對普京外交轉向的理解還有待深入，但多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變動與其內部社會經濟發展取向之間還存在某種相對的獨立性。特別是像俄羅斯那樣的大國，即使在對外政策上出現了重大調整，但就其內部發展來說是不那麼容易被「融入」和被「改造」。甚至就在美俄關係得到大幅度突破之後，普京迅速地、紮實地推進了與被稱為「邪惡軸心」的伊朗、伊拉克、北朝鮮的合作關係，而且得到了實際利益，這也使得那些認為俄羅斯會「投入西方懷抱」的預言者大跌眼鏡。

經歷了近四百年學習西方過程的俄羅斯始終沒有「變成」西方國家。學習西方畢竟不能等同於把帶有深厚本土特徵的國家變成一個「西方國家」。在美俄關係大幅突破之後，普京迅速推進與被稱為「邪惡軸心」的伊朗、伊拉克、北朝鮮的合作關係，這也使得原來認為俄羅斯會「投入西方懷抱」的預言者大跌眼鏡。

### 三 結束語

「九一一」之後的大國關係特別是中、美、俄三國相互關係包括歐洲所起的作用，是朝向協調互利，還是互相抗衡的方向發展，這也許是冷戰後國際社會發展中最重要問題之一。

雖然，目前中、美、俄三邊關係中面臨着若干共同問題，可提供發展相互關係的基礎，但是並非不經過艱苦的努力、不遭逢曲折甚至倒退，就能夠自動地轉化為和諧協調的相互關係格局。這裏牽涉到如何理智地處理好當前三邊關係中所出現、同時也是不可避免的若干不均衡狀態。

從根本上說，當前國際社會的最不均衡態勢在於獨大的力量格局與缺乏國際體制支撐這兩者之間的鮮明反差。美國學界若干權威人士已經對此公開表示深切的擔憂。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今年2月間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撰文表示，「美國鷹正在往下墜」。於是人們驚呼由80年代肯尼迪 (Paul Kennedy) 《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所引發的爭論如今正在重現。轟動一時的《凱恩斯傳》(John Maynard Keynes) 作者斯卡德爾斯基 (Robert Skidelsky) 重提二戰後初年的美英爭端，直言「美英特殊關係」之存在主要並非在於共同意識形態，恰恰因為兩者實力差距懸殊，意在警告不要迷信所謂的「反恐聯盟」；甚至連當年最為樂觀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最近針對日益加深的美歐矛盾公開發表文章，宣稱：「西方民主開始分裂」。新保守主義者卡岡 (Robert Kagan) 最近也在卡耐基基金會《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 上發表的長文，痛陳美歐之間已經「不存在共同的世界觀」，引起了相當大的震動。上述警告未必危言聳聽，多少反映了問題的嚴重性。

當然，回顧整整一部國際關係史，還是有着若干歷史的借鑒。十九世紀為甚麼會出現一個維也納體系？為甚麼會出現維也納體系之後所謂的「百年和平」？當時的局面與當前相比並不是沒有共同點。用非常簡約的、省略了許多複雜因素的一句話來表達：十九世紀的維也納體系時代和今天冷戰後的國際社會，都是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這三者幾乎同時並存的一個時代（當然這個社會主義不是導致蘇聯垮台的那種「社會主義」）。這三種主義、三種傾向相互作用的一個歷史狀態，是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共同點。儘管今天形勢有了很大變化，而且產生了種種複雜的因素，情況不完全一樣。儘管美國獨一無二的霸主地位影響深遠，但不可忘記的是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Grand Chessboard*）中所言，美國是當今最大的、也是最後的一個帝國，美國要努力學會與歐洲、中國等大國在今後若干年中平起平坐。單純的多極抗爭未必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前景，但多種文明背景下的多元發展理應是符合人類生存狀態的一種將來。因此，這裏表達的一個關鍵意思是，十九世紀歐洲的基本結構是多極化。也就是說，歐洲當時是處於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及自由主義三種趨勢並存的情況，是不是由於多極化力量結構的存在導致了「百年和平」呢？如果是這樣，那麼在具有某種相似歷史背景的今天，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嘗試推進國際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以實現和平的目標？這就是本文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十九世紀的維也納體系時代和今天冷戰後的國際社會，都是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三者幾乎同時並存的時代。是不是十九世紀歐洲的多極化力量結構導致了「百年和平」呢？如果是這樣，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嘗試推進國際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以實現和平的目標？

### 註釋

- ①② 見2002年6月1日《人民日報》網上版(www.people.com.cn)：普京總統專訪。
- ③ 卡萊歐(David Calleo)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九一一』之後的大國關係」國際研討會上的演講。
- ④ David Calleo, *Rethinking Europe's Fu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⑤ "After September 11: A Conversati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65-s (Thanksgiving 2001): 66-71.
- ⑥ Zbigniew Brzezinski, "New Age of Solidarity? Don't Count On It", *Washington Post*, 2 November, 2001.
- ⑦ Paul Wolfowitz, "Remembering the Futu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59 (Spring 2000).

**馮紹雷** 教授；1982年華東師範大學畢業；1986-87年前蘇聯留學；曾任華東師大人文學院院長；現任華東師大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亞歐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制度變遷與對外政策》、《一個歐亞大國的浮沉》、《國際關係新論》等書。